

列宁研究

第 4 辑

1995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列宁研究

第 4 辑

1995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列宁研究（第4辑）

主办单位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主 编 岑鼎山
编辑者 《列宁研究》编辑部 电话 6033377—301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发行单位 《列宁研究》编辑部发行组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33）
银行户名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部 帐号 890684—82

列 宁 研 究

目 录

新文献

- 给莫·伊·弗鲁姆金和波·斯·斯托莫尼亚
科夫的信..... (1)

理论研究

- 列宁新经济政策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 米·米·戈里诺夫、谢·弗·察库诺夫 (5)
- 1922—1924 年苏联币制改革概况
..... 格·雅·索柯里尼柯夫 (35)
-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问题与经验
..... B. П. 德米特连科 (52)
- 韦伯与列宁：谁是对的？..... 尤·达维多夫 (75)
- 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构想..... 刘彦章 (90)
- 私贩粮食的活动和 1918—1920 年苏维埃
粮食专卖..... 亚·达维多夫 (99)

史料选编

- 布哈林给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信..... (120)
- 高尔基和克鲁泡特金给列宁的信..... (126)
- 20 年代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Ю. 戈兰德 (135)
- 列宁对 1922 年驱逐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
..... А. 加克、А. 马萨利斯卡娅、И. 谢列兹涅娃 (152)
- 1923—1924 年争论的背后 亚·科兹洛夫 (173)
- 1917—1922 年的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
..... 阿·利·利特温 (188)
- 俄国自由主义者谈俄国革命 德·阿宁 (206)

列宁著作背景材料

- 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 (续二) (214)

人物与事件

- 苏连·斯潘达罗维奇·斯潘达良 ... В. А. 阿韦季相 (256)

给莫·伊·弗鲁姆金和波· 斯·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¹

致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
抄送：托洛茨基

我由于病情恶化，不得不放弃出席全会。我很清楚，这样对你们我感到很歉疚，甚至非常尴尬，但是反正要我讲话我是讲不好的。

今天，我收到了随信附上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来信²。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我都赞同他信中的意见，大概只除了信中最后谈的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我将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我赞同他的意见，由于我生病，我请他在全会上出面维护我的观点³。

我想我可以把所要维护的观点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捍卫对外贸易垄断的基本原则并完全彻底地肯定它（垄断）。

第二：将阿瓦涅索夫提出的实施这一垄断的具体计划⁴提交给专门委员会进行十分细微的讨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不应少于一半。

第三：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应该单独提出来，而且我以为，如果托洛茨基的要求仅限于让以发展国有工业为标志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各方

面的活动作出反应的话，我和他大概将不会有什么分歧。

我还希望在今天或明天写好一份给中央全会的声明⁵，谈谈这个问题的实质，并寄给你们。至少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中央全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话，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我要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宣布目前的分歧。

列 宁

1922年12月12日

电话口授，根据打字稿刊印，全文载于1971年海牙—巴黎出版的《托洛茨基文集（1917—1922年）》第7卷第774—776页，1982年部分载于《列宁年谱》第12卷第534页

注 释

- 1 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和俄罗斯联邦驻柏林商务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抄送托洛茨基）是为准备即将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而通过电话向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的。

对外贸易垄断根据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确立，并为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一再肯定。由于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和同国外贸易往来的扩大，不少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赞成取消垄断制。反对对外贸易垄断或赞成加以削弱的有布哈林、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弗鲁姆金等人。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马·列扎瓦受列宁委托草拟的《对外贸易提纲》于

1922年3月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其中强调必须加强垄断，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新条件下的商品进出口原则。5月22日政治局根据列宁的建议再一次确认了对外贸易垄断。

俄共（布）中央全会10月6日会议（列宁因病缺席）根据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通过一项决定，规定暂时准许“某几类商品或在某几处边境出口”。列宁不同意全会的这一决定，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对外贸易垄断。

10月12—13日列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写了一封给中央书记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信中建议延期两个月解决这个问题，即延至下次党中央全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列宁的建议。

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本应在1922年12月15日（后改为12月18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再一次讨论。

全会前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收集关于外贸状况的材料并成立研究这些材料的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对俄罗斯联邦各驻外商务代表处的活动进行了调查；同中央委员们，同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分别谈了话；写了许多信和便条，要那些还在犹豫的同志们相信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同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商量由他们在全会上发言。

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列宁未能参加全会的工作。

中央十二月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撤销了上次全会的决定。

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85、220—223、328—332、333—334页；第52卷第545、547—553页等。

2 指托洛茨基1922年12月12日的信。托洛茨基在信中写道，必须根据总的经济需要灵活地调节对外贸易。他认为这个任务应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担负。

3 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写于1922年12月13日（见《列宁全集》第2

版第 52 卷第 548—549 页)。

- 4 列宁所说的“阿瓦涅索夫计划”是指“人民委员会就国家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调查俄罗斯联邦各驻外代表处工作的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的基本结论是：无论是从经济上考虑还是从政治上考虑，都不能“完全地、即使部分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 5 全宗，第 2 目录，第 35 卷宗，第 72 页)取消对外贸易垄断。阿瓦涅索夫赞同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他认为这一垄断不应直接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实施，而应由那些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监督下的大型经济单位(如辛迪加、康采恩)来实施。
- 5 列宁是 1922 年 12 月 13 日用电话口授《关于对外贸易垄断。致斯大林同志并转中央全会》这封信的(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28—332 页)。

(高晓惠译 成士校)

列宁新经济政策构想 的形成与发展

米·米·戈里诺夫

谢·弗·察库诺夫

新经济政策在我国只有几年的历史。在人民的心目中，那是个商品充裕、有吃有穿、国泰民安、科学与艺术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斯大林时期的史学则把它变成了工业化与集体化之前的一个短暂的阶段，把当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说成敌人与间谍猖獗一时。

改革使历史学家和政论作家受到鼓舞。有关新经济政策、它的经验、它与当代的关系的文章纷纷出现，令人目不暇给。由于过去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观点的内容和演变缺乏研究，便出现了论战双方各自摘取列宁语录为己所用的情况。本文试图客观地对列宁的观点及其演变和矛盾进行探讨。

迫不得已的转变

随着内战硝烟的逐渐散去，胜利者愈来愈多地提出了“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如何振兴备受战争与革命摧残的国家？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这方面的探索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始于1921年初，

而是在1920年初即开始进行了，探索者不仅有俄共（布）党员，而且有国内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表。党稍稍松动战时状态的“螺帽”，即遇到一些彼此竞争、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一切都促使党确定一条“新的”、和平的政治路线。从1920年年中起，党内出现了一种民主化的、较为自由地讨论当前问题的趋向。

俄共（布）领导层决定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不过是转上“平时共产主义”的轨道罢了。列宁作为执政党领袖和苏维埃国家首脑，同样认为不必改变3年经济政策的总原则，他继续强调国家强制是摆脱经济危机和进一步振兴经济的基础。

然而，继续实行余粮收集制、征集规模的逐年扩大却导致农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播种面积缩小、产量下降、国家实际入库粮食数量减少。1920年已可清楚地看出，农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初即开始出现取消余粮收集制并向粮食税过渡的建议。报刊上悄悄开始讨论起支持和发展农户的“前提和刺激因素”来了。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托洛茨基是最先试图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之一。他于1920年曾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粮食和土地政策方面的建议，即“以一定的提成率（一种实物形式的累进所得税）”取代“没收余粮，用意是使得农民的耕耘或者精耕细作有利可图”。这条建议未被采纳，但人们知道这条建议。地方上也出现了“异端邪说”。1920年有些地方曾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

列宁当初对粮食税的思想也并非格格不入。他说，“关于实物税和余粮收集制的立法问题，早在1918年年底我们就提

出来了。实物税法在1918年10月30日就通过了。但是，这个向农民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虽然通过了，却并没有执行。”^①国内战争起了阻碍作用。而后来，革命家的禀赋曾一度使领袖投入战时共产主义空想的怀抱。他在1922年指出：“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②

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坚决反对任何向粮食税过渡的企图。这一立场也反映了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在于取消或者部分限制国家对粮食分配的全面垄断就为粮食在国有范畴之外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土壤。这种自由流动恰恰意味着部分恢复贸易、市场，也就是部分恢复资本主义关系，因为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以任何形式容许资本主义关系，这是哪位领导人都无法同意的。因为那不只是意味着修正整个过去的政策，而是意味着实际取消这一政策，意味着突然中止执行这一政策，意味着在快速奔向梦寐以求的目标之后的向后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人，包括列宁，很长时间都不同意以粮食税来取代余粮收集制。

然而，农业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解决，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政府确也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及其理论原则的主要缺点在于：政府仍然把政策建立在强制即余粮收集制的基础之上，余粮收集制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种子储备（对播种实行国家调节）。列宁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2页。

② 同上，第42卷第182页。

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发展农民经济。”^① 这里的发展是打算通过将农业改造成为集体农业来实现。

当时列宁和其他领导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想考虑关于恢复农业和摆脱危机的途径的不同意见。关于必须根本改变粮食政策和向粮食税过渡的问题，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提出来了，但代表大会却未予审议。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完报告后，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费·伊·唐恩发言说：“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粮食政策破产了，因为尽管它夺取了3000万普特粮食，付出的代价却是到处缩小播种面积（几乎只及原来的四分之一）、畜牧业下降、经济作物停播、农业大大衰落和从农村夺取粮食。”他认为加强对农业的国家干预的办法（播种委员会、播种计划）是有害的，只会在农民中造成反革命行动的基础。

直到1921年春天出现社会政治危机、面临丧失政权的威胁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方才意识到政策已是非改不可了。从1920年开始，全国各地农民暴动接连发生。1921年3月1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叛乱分子占领了喀琅施塔得和军舰，提出了“打倒右派和左派反革命”、“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等口号。

1921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审议了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问题。成立了起草决定的专门委员会。2月24日，委员会向中央全会提交了《中央委员会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草案经讨论和最后加工后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45页。

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是党接受了粮食税思想，向新经济政策迈出了第一步。

退却的两个阶段

代表大会开幕后第7天审议了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问题，由列宁作主报告。列宁所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他要说服代表大会、说服全党接受仅在3个月前的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已遭到坚持屏弃的那种复兴农业的方法。不过列宁手里的论据颇有分量：波及省份愈来愈多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暴动，世界革命处于低潮，喀琅施塔得叛乱。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得出两点基本结论：第一，“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我们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①

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必然引起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关的许多严重政治问题。因为取消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所遵循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构想的重要原则之一——对农业生产和食品分配的国家垄断制和国家直接调节的破产。在这方面列宁得出了重要的一般理论性的结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1—52页。

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①

在论证粮食税思想时，最令人感到怀疑和不解的是商品流通、贸易自由以至资本主义必将在此基础上恢复和活跃起来的问题。列宁对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若干基本思想及其实际体现的形式表示怀疑。他指出，党醉心于国家对一切实行调节，首先是忽略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即“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其次，“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这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②最后列宁得出结论：在理论上，以余粮收集制的形式出现的农产品国家垄断制事实本身，“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不是“最好的办法”。^③

照列宁看来，去除这些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商业、市场的活跃开辟道路，就可以给小农提供经营的经济动因，并同时保住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问题在于掌握分寸，”列宁说道。他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商品流通、市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复兴，并最终导致劳动者政治权力的丧失，反之，受国家调节的贸易、市场保证了同农民的结合，可以做到非但不破坏、而且甚至加强这一权力。列宁强调说：“纸上的东西是满足不了各个阶级的，只有用物质的东西才能使它们满足。”^④所以列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页。

② 同上，第55、56页。

③ 同上，第63页。

④ 同上，第54页。

宁才谈到“允许”贸易，“允许”“一定的”贸易自由。

代表大会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列宁同其他党和国务活动家加紧宣传大会的决议。他感到吃惊的是，党员群众接受了粮食税思想，却无法同意必须在我国发展贸易和资本主义的想法。

结果，1921年5月便很有必要召开一次党的非常代表会议，以便讲清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讲清拟在农业、财政、合作社等方面和小工业内进行的改革的内容。列宁在代表会议开幕的一个月前撰写了《论粮食税》一书。该书清楚而系统地介绍了列宁对于粮食税思想和1921年上半年新经济政策的原则的看法。

“究竟这一过渡是从什么过渡到什么？”照列宁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糊涂就是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的原因所在。俄国的历史现实，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并不是发达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小农户的汪洋大海。在列宁看来，小农户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会往资本主义方面演变，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最起码的道理。就是说，必须以经济现实为根据，寻求我们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几个阶段。

列宁认为，当时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近一个阶段便是组织业已恢复的工业与农民经济之间的大规模产品交换。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工农业尚未恢复之前需要某些中间环节。因此，列宁在重申将来俄国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同时，向大家提出了寻求这些从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的中间环节

和辅助办法的任务。他写道：“关键就在这里。”^①在理论概念上较为短暂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多阶段的过程。

改行新经济政策的头几个月，都是用来寻求实施该政策的形式和方法。曾先后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负责拟定和实施政府改行粮食税的主要决定、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改组合作社，一个研究如何使信用系统、货币流通、预算工作和税法适应新的情况的问题。

除了理论和法律问题而外，改行粮食税提出了一个纯粹实际性的问题：如果农村以粮食税形式向城市无偿提供的仅仅是城市所需食品的一部分，那么不足部分如何“索取”呢？提出了建立工业品储备和组织同农民的商品交换的任务。按照列宁的想法，在工业已被破坏殆尽和工业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迟迟不来”的情况下，租让制、广泛吸引外资、甚至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购买日用品是当时迅速建立和增加这一储备的唯一现实的可能途径。

这便是列宁在1921年3月充满信心的依据，他相信只要无产阶级掌握着这一同农民进行交换的独特储备，无产阶级政权就能够保住和巩固，与此同时只准许有极其有限（在地方流通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工业与农业“结合”的主要方式决定了货物交换是直接的、绕开市场的交换，也就是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和合作社进行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

然而改行粮食税后国家的发展却出乎列宁的预料。他的利用租让制的希望落空了。暴露出工业品不足（初夏其主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6页。